

肩负时代使命 繁荣人文学术

——《人文论丛》首卷出版座谈会纪要

杨 华

1998年12月15日,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在该校举办了《人文论丛》出版座谈会。应邀到会的有武汉地区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(其中有武汉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、湖北大学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、《江汉论坛》等)的学者,省市新闻出版、理论宣传部门的相关人士(包括部分报纸的“读书版”编辑),以及武汉大学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,共计20余人。会议围绕《人文论丛》的编辑出版,就当今的中国文化研究以及人文科学的创新发展等问题,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

《人文论丛》是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辑,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科学研究集刊,年出1卷,此次出版的是首辑1998年卷。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成立于1996年,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机构。它依托该校历史悠久、实力雄厚的文学、语言、历史、哲学等人文学科,将各学科的学术优势集于一体,研究中国文化的过去和今天,关注中国文化的未来,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,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。该院聘请若干海内外知名学者(如杜维明、饶宗颐、谢和耐、谷川道雄、程千帆等)担任学术顾问,聘请部分活跃在学术前沿的在汉学者担任学术委员,团结和协调一批创造力旺盛的中青年学人对有关课题进行研究,两年来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,已初有成效。

《人文论丛》的编辑和出版,是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学术活动之一。当今人文学术研究十分活跃,海内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蔚成热点,为了面对新形势,发扬老传统(解放前该校就有《武大文哲季刊》,颇知名),武大中国文化研究院自成立伊始便着手编辑和出版《人文论丛》集刊,以像其它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一样(如北京大学的《国学研究》),建立独特固定的学术园地,发表学术成果,交流学术信息。《人文论丛》发表人文科学领域专精而富于创识的论文,向校内外、海内外公开征稿,严格审稿,选取录用;它注重学术规范,营造学术氛围,追求学术个性,正如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、《人文论丛》主编冯天瑜教授在《卷首语》中所说:“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兼采,义理、考据、辞章并重……

期盼‘有学术的思想,有思想的学术’的锐意进展”。

与会学者一致称赞《人文论丛》的编辑和出版是学术界一大善举,认为在当今人文科学事业不太景气的状况下,武汉大学的有关主管部门、中国文化研究院和出版社都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,十分可贵。利用武汉大学的人才优势和学术资源,形成一方园地,不仅有利于展示武汉大学的人文科学实力,而且有利于武汉地区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们集结力量,互相勉励,共同前进。如果说经过学者们的长期努力,今后有可能形成一个“珞珈学派”(当然不是以某一大学某一地区为界划)的话,那么《人文论丛》的连续出版,将会起到重要作用。此次出版的首辑1998年卷,经过主编、编委、执行编辑的讨论,选录论文40篇,共70万字。副主编郭齐勇教授介绍说,其中既有前辈学者(如石泉、萧父等)半世纪前的旧作,也有青年学人(如单波、钱婉约等)的雏凤新声。石先生发表的《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与淮军之失势》,是作者于1948年夏在陈寅恪教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;萧先生发表的《康德之道德形上学》,是作者就读于武汉大学期间于1947年在万卓恒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学士学位论文。二文不唯在当时具有前沿性,今日读来亦创意犹然。葛兆光教授近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批半世纪前的学位论文,他将其整理出版,并多次著文谈到学术薪火相传的意义,此次《人文论丛》发表二位学者的旧作,并附上其学生邓晓芒、李维武教授语重心长的跋语,今天的青年教师和在读学生读后当引起警策深思。

学者们认为,《人文论丛》首卷的其它论文也颇具特色,如江天骥教授以访谈的形式,浓缩道出他近年对文化、哲学以及人文精神问题的总体思考,条贯中西,通达开阔;程千帆教授将他的《程氏汉语文学史》选章发表,清新流畅,别开生面。总的来说,这些文章既有细微个案的历史考证(如《梁启超购读〈轩语〉与〈书目答问〉二书时间考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汉晋若干地理补正》),也有恣肆放达的宏观博论(如《意识·语言·文化》、《中国人文传统论略》);既有地道的国学研究(如《九店楚日书校读及其相关问题》、《〈天泉证道纪〉之史料价值》),也有对域外文化的观照(如《“美国主义”与文化批评》、《现代道德问题的追问与回应》)。

不能说每一篇都遽成定论，但都是言之有物，言之成理的。

二

《人文论丛》是一个缩影，透过它不仅可以看到武汉大学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状况，而且可以窥测到全国人文科学的最新动态。因此，与会学者对当下人文学术研究如何创新发展提出了各自的见解。

1. 强调学术规范

学者们认为，在营造学术氛围时应特别注意学术规范，中肯的学术批评极具现实意义，如今年《历史研究》第1期所刊发的尖锐书评是十分必要的，它给整个学术界一个冲击。时下书评不少，但优秀的不多，常见好友熟人互相吹捧，甚至干脆由作者自己捉刀。好的书评固然不是常见的官样谀词，但也并非都是批判和指责，优秀的书评应当是由真正的专家所为，其实写来并不轻松。其他在座者也呼吁多出现一些主题评论性文章，对各个专学领域进行高屋建瓴的总结和前瞻，为后学节省精力，指明方向。

部分学者指出，一个学术集刊的生命力在于整合性、创新性和前沿性，这也是当今人文科学研究亟需注意的。应当将学术上的继承和创新很好地统一起来，这是人文学术的生命力所在；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都应当保持原创性和首发性，始终在学术研究中提供新的信息，不能炒旧作。其他发言者也对“学术打假”表现出同感。针对大陆目前发表的人文学术论文中，普遍存在着缺乏学术前史的交代、注释不清、引述不明、格式不规范等问题，与会学者们也发表了批评性意见。

2. 关注时代，直面“问题”

有学者认为，人类文化史一再昭示，转型时代是学术创新、思想攀峰的当口，当今纷至沓来的社会转型诸景观，正给学者们提供着丰沛的源头活水，从历史、现实、未来的纵深时间向度，和本地、本国、世界的广泛空间向度，对转型时期的文化景观作深入的探讨，正是当今学人的使命。

大家一致表示，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，人文研究应当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，还是以人文研究为主旨的学术园地，都应当关注一些重大的时代课题，这样方可对下个世纪的后人有所交代。如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、中国的现代化问题、传统的继承性问题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问题、中西比较问题等等，这些既是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“老”理论问题，也是当下非常切实的前沿现实问题，只有将时代性与现实性结合，才能为人文学科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。

有学者发言说，应注意中国文化研究的世界性，“民族的就是世界的”固然不错，但只有在世界主流文化中确立自己的位置，才会真正成为“世界的”。与英文世界及其它海外汉学界进行沟通对话，亦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。如何沟

通？应当沟通人类文化的一些根源性问题、诸人类文化间的共同性问题，即所谓“元问题”，如跨文化理解问题、普遍人权问题等。我们现有的文、史、哲各学科之间的沟通，也正在于这些“元问题”上。学术界的种种“热点”终将变冷，但这些“元问题”不会过时。若瞄准这些“元问题”，《人文论丛》和当今的中国文化研究都会起点更高些。

3. 提高学术品位

不少学者将《人文论丛》与时下方兴未艾的民间学人刊物（如《原学》《原道》《学人》等）进行了对比，认为《人文论丛》应找准位置，办出特色，方能立足学术之林，并垂之久远。大家对《人文论丛》和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的期望，也是对当今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期望，《人文论丛》的定位不妨再高些。有学者指出，几十年前的《燕京学报》《古史辨》《食货》《史语所集刊》等为什么至今还是做学问的案头必备之书，就是因为它们有特色，对每个问题的学术史交代得清晰，既是扎实的专学，又有通观的史识，每篇文章都耐读，每篇文章都解决了问题。这也是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。对于《人文论丛》首辑在操作过程中认真负责，不苟且、不拼凑而力图办出特色的努力，与会者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

三

就《人文论丛》如何形成特色，与会学者们还献计献策，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。例如，有学者主张，应当注重人文学术研究中边缘、交叉、渗透的进展和成果，应扩大信息量，紧紧跟踪学术的时代脉搏，甚至可突出学术研究的“新闻性”。还有学者主张，中国文化研究不应当只局限于古代部分，近现代也有丰富的内容，以往的文化研究对此多有忽视，目前这方面成果渐多，也成为与海外对话的一个大话题，《人文论丛》于此可适当加强。也有学者建议，每一辑可设定一两个大的主题，围绕这些主题展开讨论，校内外、海内外不同专业的学者可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观点，促进沟通，逼进前沿。

会上，编委会还对第2辑（1999年卷）的内容作了简单介绍，如设置了“经典反刍”、“文字语言学研究”、“明清社会·经济·文化”、“中国近现代社会调查与研究”等栏目，并就版式、装帧等方面的改进提高作了说明，预计在明年夏天面世。与会的学校领导和出版社等有关人士都表示，要支持《人文论丛》连续出版下去，为人文科学的学术繁荣作出贡献。

作者：杨华，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；
武汉，430072

（责任编辑 吴友法）